

·成果简介·

我国城镇化和城市体系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

冷疏影 宋长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北京 100085)

[关键词] 城镇化,城市体系,理论,新进展

中国的人文地理学先天不足,除了经济地理学外,其他各个分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期没有得到重视和发展。改革开放以后,在老一辈地理学家“复兴人文地理学”的呼吁下,城市地理学获得了迅速发展,周一星教授就是20世纪80年代取得出色成果而涌现出来的城市地理学的后起之秀。1990年以来,他连续负责的5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内含2个重点项目),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城镇化和城市体系理论研究工作,不断取得具有国内外影响的成果。

1 城镇化水平与城市规模的度量

周一星的研究工作一直以城镇化与城市体系为重点。早年曾揭示城镇化水平与人均GNP对数值的统计关系,纠正了R. Northam的论断,在理论上把城镇化过程 and 经济发展过程的阶段性逻辑地统一起来,为城镇化水平预测提供了简单可行的模型;他提出城镇化“相对均衡论”和“绝对均衡论”的概念,认为分析中国经济地域差异不能片面地只重现象不重条件。在我国城市发展方针的争论中独树一帜,以城市经济效益与城市规模之间呈弱正相关为理论基础,反对以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小城市为特征的“规模政策”,对新时期的城市发展方针影响深远。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编辑出版专集,最早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城镇化研究成果。在城市体系领域,他积极倡导城镇体系规划,为地理学在城市规划领域的实践打开了空间;以中国的实证研究为基础,提出城镇规模等级体系的波浪式循环上升理论,对公认的城市规模分布演化规律提出了异议。提出城市职能三要素的概念,首先完成我国城市的职能分类,发展了职能分类的理论和方法。

2 城镇与城市实体地域空间概念的建立

随着研究的深入,周一星越来越感到中国城镇概念和统计的混乱从基础上阻碍着我国的城市发展和城市研究,20世纪90年代的体制转型和全球化趋势又对城市地理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挑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给他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1991—1993年执行的“中国城市地域指标体系研究”为我国系统跟踪研究中国城镇概念和统计口径奠定了基础,他最早分析了“第4次全国人口普查”(四普)城镇人口统计标准存在的问题,考察了欧美的标准,前瞻性地提出建立中国城市实体地域概念的思想,并应用到了第5次人口普查中。“人口密度原则”和“建成区延伸原则”的采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2003年201次香山会议讨论中国城市发展的科学问题时,他把城镇概念的正确性作为“城市发展的第一科学问题”提出来,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战略研究中,进一步建议政府把“城乡划分的空间识别系统”作为国家基础的信息平台来建设。

3 城市空间演变与都市连绵区的界定

1994—1996年由周一星设计和联合主持的我国人文地理学第一个重点项目“中国城镇密集地区空间集聚与扩散研究”,从不同空间尺度研究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人口与经济的集聚与扩散,揭示了我国在宏观层次上集聚与微观层次上扩散并存的规律性现象,首次提出了都市区和都市连绵区的界定标准,提出都市区是大中城市集聚与扩散的统一体,都市连绵区是经济发展沿着阻力最小方向延伸的必然规

本文于2005年5月20日收到。

律,并作出了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已经形成世界大都市带空间格局的重要论断。他在这个课题里还首先发现中国大城市已经实现从向心集聚向离心扩散的机制转换,进入郊区化的发展阶段。中国不同于西方的郊区化过程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浓厚兴趣和密切关注。

4 区域经济联系与城市体系格局的划分

在2001年结题的“开放条件下中国城市体系的空间结构”研究,以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城市体系为背景,从理论上提出了非均质条件下城市发展的“主要经济联系方向论”,从现实角度补充了均质条件下的中心地理论;初步总结了近20年来中国城镇化的进程和城市体系演变的状况和主要因素;用与世界经济联系的指标对我国城市进入国际城市体系进行了展望;用铁路客货流、人口迁移流、航空客流、进出口贸易流、信件流等实证资料深入研究了我国的对内对外联系,在此基础上划分的全国3个一级城市经济区,11个二级城市经济区,深刻揭示了开放条件下我国经济联系的空间格局,对后来泛珠三角、山东半岛城市群、武汉经济圈、海峡西岸经济区等一系列城市区域发展现象的提出提供了理论依据。

5 城市空间自组织与城镇化水平的预测

周一星和他的研究群体在2004年起动的重点基金项目“中国的城市变化和自组织的空间动力学”里,继续对中国城镇化和城市体系进行时空过程分析,并试图建立“自组织城市网络”的基础理论框架。配合国家“十一五”计划的编制,第一年的工作回答了“十一五”计划期间以及更长时段内中国城镇人口和城镇化水平的增长预测。发现国家统计局现在公布的,从1996年开始至2003年连续8年城镇化水平每年增长1.44或1.43个百分点的态势,存在很多水分。这种超高速匀速增长是由于五普和四普之间约4.7个百分点的口径差距修补在1995—2000短短5年内的结果,口径修补因素在增长中就占了66%(即0.94个百分点),这样的增长速度不能直接延伸到2001、2002和2003年,也不能作为预测未来城镇化发展的现状基础。不然对21世纪中国城镇化走向的判断和对“三农”问题的解决可能产生误导。实际上我国目前无力解决如此速度下每年增加(1950—1970)万农民转入城镇的要求。这样的国家“高”速度,会引发各地城镇化水平更高速度的攀比以表明“政绩”。课题组用科学合理的方法首先建

立了预测的现状基础,然后用联合国法模型进行了理论值的预测,再用经济增长、新增就业岗位增长、城市建设用地增长三方面的可能性进行校核,最后向国家提出了今后我国城镇化速度的建议。认为在理论上2010年城镇人口比重可能达到46%左右,2014年可能超过50%;2010年我国城镇人口的理论值约6.34亿,一年需要转移的乡村人口约1522万;每年从乡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将在2014年达到峰值,年转移量约为1700万人。但从经济增长速度、城镇就业岗位和城镇建设用地的可能性来校核理论预测值,课题组认为:在2000年城镇化水平的基础上,我国的城镇化仍会以较高速度推进,一年提高0.6—0.8个百分点是比较正常的,超过0.8个百分点已经是超高速,连续多年超过1个百分点是超高速的、有风险的,连续多年的1.44个百分点是虚假的、可怕的。

6 郊区化趋势与郊区化发展模式的比较

自从1992年发现中国大城市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了城市郊区化以来,已经在国内外产生广泛的影响。以北京为例,跟踪90年代的发展趋势,发现外来人口继续快速在郊区集聚的同时,人口从中心区扩散的强度不断在增加,扩散源和扩散距离也在扩大。80年代推动中国城市郊区化的那些基本动力,仍然在起作用。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和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逐步深化,中国的制度环境、城市居民的消费观念和人们的择居观念都在发生变化,中国的郊区化在原有的基础上也有了新的变化。住宅的迅速市场化、第二住宅兴起、私家汽车激增、大型超市进入郊区等是导致这些变化的新因素。变化的总趋势是自发、主动郊区化的成分增加了,被动郊区化的成分减少了;追求郊区舒适环境的成分增加了,仅限于扩大有限居住面积的成分减少了;市场管理的因素增加了,政府计划管理的因素减少了;社会空间分异的程度增加了,原有社会相对均衡、融合的程度减少了。一句话,中国的郊区化有向西方郊区化的模式靠近的趋势。从中至少可以得到两点启示。(1)这种趋势体现了市场经济下的普遍规律,这种普遍性实际上来自人们的发展理念和追求美好生活的共同性,是由富裕起来的人的本性决定的。(2)中国的郊区化不会也不应该和美国完全一样。中国的人地关系和环境结构无力支持美国式的低密度、高能耗、无序蔓延的郊区化道路。符合中国国情的郊区化需要同

时运用市场的力量和政府调控的力量,要“因势利导”。

7 结 语

从周一星教授不断取得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他设计主持的基金课题能紧紧抓住中国城市发展的基础理论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用转型中的中国实践去丰富、发展西方的城市地理理论。研究群体发

表了大量中文论著的同时,已在国际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24 篇,含国际 SSCI 刊物论文 12 篇,并被国际上研究中国城市的学者大量引用,在我国人文地理学家中成绩显著。他的研究实践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了解研究领域的国际水平,针对国家需求和国情实际发掘科学问题,是基础研究不断深化、不断创新的不竭源泉和动力。

THE CONTINUOUS PROGRESSES OF URBANIZATION AND URBAN SYSTEM STUDY IN CHINA

Leng Shuying Song Changqing

(Department of Earth Sciences, NSFC, Beijing 100085)

Key words urbanization, urban system, basic study, progress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与我的回国之路

最近,我们实验室关于肝癌的细胞信号转导途径的研究论文先后在肝脏和消化道疾病领域最有影响力的期刊 *Hepatology* (影响因子 9.6) 和 *Gastroenterology* (影响因子 12.8) 发表,关于肝癌蛋白质组学的论文先后在 *Mol. Cell Proteomics* (影响因子 8.3) 和 *Proteomics* (影响因子 5.7) 等杂志刊出,有三项应用专利获得授权,实验室在 2004 年度取得了重要成果。

成功难忘攀登路,饮水不忘掘井人。回顾回国发展的充满艰辛和挑战的征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我和我的实验室的支持历历在目:当我从零开始,回国组建生物信号转导实验室和临床治疗病房的时候,我得到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支持;当我急需资金开展肝病跨膜信号转导研究的重要课题,与国外同行抢时间、争速度的时候,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支持;当我们与德国科学院建立稳定合作关系,开展高层次学术交流的时候,又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的支持……。这些经费犹如雪中送炭,使我们的实验室在短短的几年中迅速发展,成为“重中之重”发展的全军重点实验室,成为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单位,也使我们有能力竞争和承担其他的国家研究项目,实现了我和我的学生们为攻克肝癌而奉献微薄之力的心愿。

近来我们承办了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了在肿瘤分子生物学研究领域有重要贡献的学者交流研究进展,他们无不赞赏和惊叹中国基础研究的快速进展、基层实验室的发展速度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力度与公平竞争机制。

机会与挑战并存。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我们实验室走上了良性循环之路,我们看到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机遇。同时,我们也看到,更多的实验室走在我们前面,更多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脱颖而出,硕果累累!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曾邀请我在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总结会上做过一次报告,当我站在这些“杰出青年”面前和行列里的时候,我感受到人才辈出的激励,发展创新的冲动和勇攀高峰的挑战;自然也感怀和难忘基金会把这些“海归”人士的希望之路引导到发展之路和辉煌之路的贡献。

回国是一种选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为我们的这种选择提供了积极的支持、热情的引导和成功的鞭策。我们期待着学科在基金会的支持下进一步稳定发展,期待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造就一批批科学新人。

(第二军医大学生物信号转导实验室 王红阳 供稿)